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以党的重要文献和领袖著作为研究中心

郭 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作者简介]郭强(1979—),男,河北邯郸人,法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与国家一体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和推动改革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传统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中不断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靠国家制度的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的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社会与国家关系,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3)02-0087-05

自国家产生以来,它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便构成了思想家们长久探究的论题。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真正关系,并在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现实矛盾关系的基础上,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P95)},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P314)}。这表明,国家回归社会将是历史的终极必然,但在通向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阶段,国家仍有存在的必要,人们仍然要面对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当然,马克思的科学设想只是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我们也不能苛求生活在 19 世纪

西欧的他详细描述远在东方的中国一百多年后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未来图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突破传统观念和模式,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断调整,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之新型关系。

一、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逐步突破社会与国家一体化关系的传统观念和模式

1950 年代,中国选择了依靠国家权力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建立起了以高度国有化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成了唯一的资源配置中心和经济社会管理中心,并通过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个人的私人领域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运作框架之内,逐渐形成了国家统摄社会、社会与国家“同构”的高度一体化模式。当然,像中国这

收稿日期 2012-09-20

基金项目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和基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AKS002)的阶段性成果。

样的刚刚获得政治独立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迅速实行现代化的种种必要条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在中央、中层和地方各级要有强有力的政府”^{[2](P304)} ,从而依靠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采用政治动员、社会整合等非经济手段将极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关键领域。这种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模式在短期内效果也确实明显,在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奠定工业化基础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当社会主义由“非常”的革命时期转向“常态”的建设阶段时,这一模式的弊端便显现出来。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由国家绝对掌控,造成经济社会活力不足;国家计划经常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变化,造成决策失误不断;国家职能包罗万象,造成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单位”与国家同构、个人被“单位”固化,造成社会和个人的自主性缺失,等等。而且“政府一旦担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惟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3](P105)}。从“反右扩大化”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化”到“文化大革命”,人们似乎热衷于依靠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政治斗争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政治的狂热却让我们丧失了良好的机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社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模式在逻辑上颠倒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实践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失误。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国情判断上脱离实际,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要求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5](P157)}。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其较系统的阐述,我们党对国家的认识逐渐清晰,认为我们制定规划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又不能超越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鉴于“物质条件不具备”的现实国情,我们党果断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这也预示着国家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统治”向“社会管理”转移,从而在国家职能层面实现了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拨乱反正。因为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政治统治职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范围的缩小而逐渐缩小其作用范围,而社会管理职能则日益深入到越来越多的领域^{[6](P148-149)}。

在推动工作重心大转移的同时,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改革的路向上看,其实就是不断打破社会与国家的一体化格局,不断调整社会与国家的不合理关系的过程。改革首先从国家控制的社会领域的薄弱环节入手。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建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社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获得了很大的自主空间;在城市,积极引进外资,支持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不受国家计划直接控制的体制外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逐步冲破计划与市场根本对立的观念,到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党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和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其概括为“国家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机制。商品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具有自主性。为此,国家通过放权让利、承包、租赁等形式,不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几次放权有着根本不同,后者的“放权”只是在中央与地方、部门“条条”与地区“块块”之间的权力调整,没有超出国家领域,而前者则是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与此同时,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私营经济不断兴起,并于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合法地位。“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7](P176)}。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预示着社会与国家关系一体模式开始走向解体,全能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变革的历史趋势。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依靠经济体制变革引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还是在西方经济学领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似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固有公式。1992年,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改革的实践,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P373)}这就打破了计划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将其载入宪法。同年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样,在经济的运行机制层面规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市场主体方面,将“国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而现代制度的两大基本要求就是“产权清晰”和“政

企分开”,从而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经营向间接监管的转变,使企业由政府及其部门的附属物转变为拥有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自我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政府与企业之间由行政上下级关系转变为产权所有关系。在微观领域,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培育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让主导资源配置的原则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取代国家那只“看得见的手”,减少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将原本属于市场运作的事情交给市场。在宏观领域,变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调控原则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方式由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变为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为适应这种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从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综合经济部门被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企业由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变为由行业协会协调。这样的机构改革适应了,也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整推向深化。

如果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与国家关系在运行机制层面的创新的话,那么,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则从基本制度层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P19)}这样,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主体的地位便从制度外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转向制度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公有制经济本身,十五大在认识上也有新的突破,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并肯定了股份制这种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将其看作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途径。“一元多样”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确立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积极探索,使资源的占有和控制逐渐呈现多样化态势。随着国有企业经验自主权的获得和国有资本从一些领域特别是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不断收缩、控制力度不断减弱。这使一部分资源脱离国家的垄断和控制,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而进入市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发展出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9](P284)}而且,非国有企业力量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具有行政性质的传统单位体制,剥离了连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脐

带,从而在经济领域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一体化的格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这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10](P548)}2003年,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对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以完善,在建立“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政资分开”的“现代产权制度”,使国家与经济领域的直接联系又斩断了一层。

三、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依靠国家制度构建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规范

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主要依靠手段是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8](P28)}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目标,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则指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层面改革的方向。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言:“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P28-29)}这明示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公共权力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权力的具体运行还要委托给执行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现实的个人,而这些掌握着管理和服务社会的公共权力的个人也有自己现实的利益诉求,这就容易造成他们利用通过权力与财富的交易为自己谋取私利,或为捞取“政绩”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法治的基本前提就是强调个人和社会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此基础上约束政府的公共权力,规范国家的自主性行为^[11]。为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8](P31)}后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重申了这一思想,并作出具体的阐释。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就是要将社会与国家纳入规范化的制度中来运作,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我们要通

过宪法和法律限定国家的行为范围,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受法律的约束,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学会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对自己施政行为的后果勇于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正当权利的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从而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就有利于使政府形成尊重社会主体权利并尽心竭力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使每个社会主体合法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并有利于遏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作越过法律界限、违反法定程序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的情形出现,从而构建起国家对社会“善治”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也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有序地与政府展开对话、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且自己利益诉求的表达行为不得以侵犯公共和他人的利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为代价。否则,一些非理性的、无序的群众性过激行为将难免发生。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导致群众无序参与和表达的原因又在于有序的参与和表达渠道不畅所致。这首先需要政府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以降低公众的信息获取成本。这就需要不断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拓展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组织的“下情上达”和互联网、媒体等公共舆论的交互传播作用,逐步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多层机制,在政府与公众刚性化的两极之间搭建起必要的“缓冲地带”,拓展二者的交流渠道,使政府与公众能够通过对话、沟通、相互妥协等方式缓解对立情形,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对立情绪的滋长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进而影响到社会与国家的和谐。

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依靠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创新,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格局被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所代替,使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由于利益多样化催生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在不断挑战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开始了基于利益关系的自组织化过程。与此同时,国家还有意识地利用其所控制的国有事业单位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依靠“行业主管部门”的立法动议使民间组织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政权。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命题,并将其提升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高度^{[12](P286)}。因为党是通过掌握国家政权而实现执政的。因而这也就决定着和谐社会是政权巩固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暗示我们党承认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存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所讲:“我们既要从‘大社会’着眼,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又要从‘小社会’着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13](P675-676)}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这里的“大社会”可以看作是包括国家在内的整个社会机体,而“小社会”的外延则是通常理解的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实现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推进政事分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13](P663)}。这样,社会与国家关系由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发展到“政府—市场—(小)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观念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必要之恶”,可以推演出“社会对抗国家”的结构关系;“国家高于社会”的观念强调国家塑造市民社会的功能,可以推演出“国家宰制社会”的结构关系^{[14](P493)}。但二者在根本上却是对立互根、两极相通,即都坚持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冲突关系。早期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虽然是以分权和对立出现的,但也不可否认社会与国家作为矛盾的双方也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统一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与国家在根本的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二者的共同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尽管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得到解决。中央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从“小社会”着手,更是从“大社会”着眼。从“大社会”着眼,最基本的就是着眼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和谐。于是,“和谐”便成了处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理念。这种理念既不否认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存在,又不将二者推向对立的两极,而是努力寻求一种良性的制衡与互动关系。在调整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中,不偏废二者任何一方,使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弊病,让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小)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14](P494)},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从而既促进国家垄断社会的局面的改变,又防止由于国家退出超过社会的接纳能力而造成社会动荡。如果把社会与国家的和谐的图景比

作一个椭圆,那么“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就是这个椭圆的两个焦点。“民主法治”意味着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法律,在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治性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均衡。“公平正义”则表明,国家通过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心理认同,以实现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统合的价值均衡。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15](P30)}正是我们党社会与国家关系和谐的理念的表达。

在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状态下,国家利益“具有不可置疑的先在性和独占性,个人处于行政依附地位”^{[16](P217)},个人利益要求绝对服从国家利益。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使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日益多元化。而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使个人对国家(通过“单位”实现)的依附性趋于减弱和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对财产权、表达权、参与权、隐私权及其他权利的诉求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渗透到了政府部门,出现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一些公权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假借“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利,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先的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7](259)}。其最突出的体现是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修正案》明确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尽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或承包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但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而且要“给予补偿”。人最基本的权利无疑是生命权。2006年,胡锦涛针对重特大事故造成的重要损害痛心地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18]。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并从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事关群众现实利益问题进行全面部署。这表明我们党对个人利益的承认与尊重,看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一致”基础上的“差别”,并积极探寻实现个人利益、协调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新途径。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坚持了社会决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符合国家向社会回归的历史趋势,既体现了社会与国家先从经济领域分化的一般历程,又反映了二者关系在当代时代的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质、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 [5]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代化[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1]容志.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J].人文杂志,2009,(1).
-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4]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A].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经[C].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6]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7]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18]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03-29.

(责任编辑 叶剑锋)